

2007 年 12 月
第 4 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December 2007
No. 4

辽、宋、金时期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

芦 敏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高丽; 高丽王朝; 古代移民; 东亚移民; 辽、宋、金移民; 归化

[摘 要] 辽、宋、金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迫使许多民户通过多种渠道迁移到邻近的高丽。高丽针对中国移民的接收与遣还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制定了相关规定。迁移到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 按照集团聚落居住在归顺州等移民州县里。他们努力耕耘、辛勤劳作, 承担居住国的租税和贡赋; 传播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文化, 为高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显示, 古代东亚移民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变动紧密相关。移民不仅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 而且还促成了不同民族的融合。

[中图分类号] D634.3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7)04-0051-07

Chinese Immigrants to Korea in the Period of Liao, Song, and Jin Dynasties

LU M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Korea; Korea dynasty; ancient migration; East Asian migration; immigrants from Liao, Song and Jin Dynasties; naturalization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Liao, Song, and Jin dynasties, under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ircumstances, many Chinese residents were forced to emigrate to the neighboring state of Korea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he Korean government promulgated some regulations regarding receiving and repatriating Chinese immigrants. By the regulations of Korean government, these immigrant agriculturalists and artisans were arranged to settle the quarters in the Prefecture like Guishun.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orked hard, paid taxes and disseminated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culture, making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ancient East Asian migr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Chinese immigrants not only promoted bilater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ut also facilitated ethnic assimilation among different communities.

高丽建国之时, 正是中国五代十国与契丹政权纷起的时代。太祖王建一面继承了新罗的外交关系, 与中国北方的梁、唐、晋、汉、周进行遣使往来; 一面推行北进政策, 与东进的契丹发生了冲突。迨至宋立国之后, 扫除割据、加强集权, 从而使东亚群雄并立的局面逐渐演变为以宋、契丹、高丽为主的三方共存状态。在这三个国家中, 契丹的军势最盛, 时常侵扰宋境, 同时也给高丽带来很大的压力。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 契丹大举南进, 兵临澶渊城下, 迫使北宋与其订立盟约。统和十一年(993)、二十八年(1010)和开泰三年(1014), 契丹又三次进击高丽, 最终迫使高丽于开泰九年(1020)“遣李作仁奉表如契丹, 请称藩纳贡如故”。^[1]至此, 契丹

[收稿日期] 2007-07-24; [修回日期] 2007-10-25

[作者简介] 芦敏, 女,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专门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成为东亚大陆最强的势力，对宋与高丽造成极大的威慑。

面对契丹的崛起，宋和高丽都曾试图结盟来共同抵御契丹，但是无一成功。利益权衡上的不同步使双方终难达成共识。结盟的失败也使宋与高丽的关系遭受重大挫折，官方往来中断四十年之久（1031—1070）。经过长期的和平安定，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高丽“遣民官侍郎金梯奉表、礼物如宋”，^[2]两国关系才再次恢复。这以后，双方互通使者、交流文化，来往异常亲密。

到了12世纪初，东亚局势再度发生剧烈震荡。女真族在东北迅速崛起，并于1115年建立金国。在辽被金打击得摇摇欲坠之际，宋乘机与金订立“海上盟约”，意图收复幽云诸州。1125年，金灭辽，随之将矛头对准宋。两年后，北宋灭亡，四处流徙的南宋政权最后在杭州得以栖身。但是很快，高宗便于绍兴十一年（1141）和金国签订了投降和约。另一方面，金通过外交施压，最终收服了高丽，这样便进一步确认了其在东亚大陆的霸主地位。与北宋时期一样，南宋和高丽的结盟依然落空，彼此关系渐行渐远，乾道九年（1173）终至断绝。不过，民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倒是络绎不绝。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少的宋、辽、金、渤海人迁移到高丽。对于这种人员迁移，史籍中常记作归德、归义、投化、投归、投、内附、来投、来附、来奔、来降、亡入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归化”一词。“归化”在当代汉语中更多地指涉翻译学中的一种翻译原则，然而在移民研究的范畴内，“归化”一般指放弃原有国籍而加入侨居国国籍，^[3]即“侨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上归属于当地国”。^[4]此用语袭自古代，如《汉书·匈奴传下》写到“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5]又如《三国志》中记曰“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6]考诸此类事例之后，学者们对史籍中的“归化”一词提出了更为精细的解释。日本的上田正昭认为“归化”意味着“钦化内归”，并与律令制下的王化思想紧密相连；^[7]石母田正进一步提出“归化人”就是指初次被吸收为“王民”的人或将被吸收的化外人。^[8]韩国的全海宗则认为“归化”一词体现着儒家的德治主义思想，它不仅针对异民族同时也针对同民族而使用，不过在韩半岛的史料中，“归化”一词绝少出现，更多地则是“投”、“来投”、“奔”、“属”、“附”等淡化德治主义的用语。^[9]其实，抛开德治主义的华美修饰，“归化”与其它语汇无非指向同一个事实，即处于边疆的同族或异族以及外国人附籍于某一政权，并接受这一政权的领导。与国内归化人不同的是外国人前来“归化”必然伴随着人员的迁移。

辽、宋、金时期前往高丽的中国移民即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迁移的，除主动迁移外，还有被强迫留下或是在战争中被虏获到高丽的被动迁移。定居之后，这些移民或为仕、农，或为工、商，将中国的一些先进技术和制度文化传播于高丽，为高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移民商人和出仕者已做出不少研究，所以本文将侧重于介绍农业以及手工业者移民，即迁移到高丽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生的移民。

一、移民的迁移原因和方式

宋与高丽疆土不接，唯有藉舟楫涉海而已，但是，海上风涛险恶，况且宋廷对出海船舶又要进行严格的检视，所以，涌入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多是从陆路进入高丽境内的渤海和辽、金民众。这些移民除了靺鞨、契丹、女真族外，还有汉族、奚族。据《高丽史》和《高丽史节

本文中指宋、辽、金、渤海统治下的各族民众，非仅指汉族、契丹族、女真族或靺鞨族。

此类人由于出众的才华而被留下出仕，故不在农业与手工业者移民范围之内。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中的“移民”和“中国移民”均指从宋、辽、金、渤海等处迁移到高丽而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移民。

要》统计，他们的人数大概有 81812 人。如果考虑到战俘以及史料记载的阙漏和统计上的偏差，那么迁移到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这些民众的迁移原因也各具风格。大致说来，渤海人迁往高丽主要是因为国破。渤海本为粟末靺鞨。武则天时，粟末部首领大祚荣率领靺鞨、高丽之众回到辽东故地建立起政权。睿宗先天中，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从此，这个政权就以渤海为号。^[10]契丹崛起后，向东拓疆，于 926 年正月灭亡了渤海国，此后其国人奔高丽者相继。从渤海人投归表可以看出，自 925 年契丹攻伐开始至 938 年渤海亡国后的十几年间，约有 38710 人进入高丽，占渤海投归民总数的 65.7 %。1029 年，时任契丹东京将军的大祚荣后裔大延琳反叛契丹，建立兴辽国，但是次年便被契丹镇压。随后的三年内又出现了比较集中的移民现象。这两次国破，共造成 26 批移民投归高丽，占到了渤海人投归事例的 92.9 %。

契丹人的投归则没有比较集中的现象，始终如涓涓细流，少则 1 人，多则 500 余人，平均每批次 37 人。契丹人迁移到高丽主要是因为生活环境恶化，连年的战争使人们的正常生活难以维持。除去 926 年吞并渤海，986、1004 年与宋的战争以及 993、1010、1014 年与高丽的三次大规模作战持续数年之外，其他小规模与宋、高丽、西夏的军事冲突也时常出现。另外，契丹为了捍卫自己在东亚的霸主地位，通常会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契丹尝“选富民防边”，但是，“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犍，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绿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真、高丽合纵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11]于是，许多人为了谋生而逃入高丽。

金人投归高丽绝大部分发生在建国前，建国后有明确记载的只有 1185 年一起，由此可以推测金人投归高丽与金、丽关系的变迁密切相关。起初，女真各部比较分裂，散居于河流沿岸或山谷之中，生产落后，服属于周边大国。史载女真“旧属高丽”，^[12]时常向高丽进贡良马、兵仗、甲冑、弓矢等军用品和貂鼠皮等各种土物，来换取高丽回赐的银钱和日用品，如衣带、货物、布帛等。但是，女真在完颜部的率领下崛起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曷懒甸之争预示出女真与高丽关系之易位。及至金建国以后，高丽已从“父母之邦”降为“兄弟之国”。而保州归属、进誓表、归还逃移人口等问题的交涉，最终确立起高丽对金的朝贡关系。国家的强盛、疆域的扩大以及生产的进步拓展了金人的生存空间，从而极大地减少了移民数量。

尽管迁移原因不同，但是这些民众都以群徙作为主要迁移方式。在 100 个可推测移民数量的主动迁移事例中，10 人以上的集体迁移就占到了 69 %，其中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群徙只占 14 %。可见，中国移民进入高丽主要以中小群体为主，尤其是 50 人以下的小群体。这些人或是数户、数十人结伴迁移到高丽，或是在某一头目的率领下迁往高丽。一般来说，比较大型的迁移都有领

表 1 渤海人投归高丽表

时间（年）	事例（个）	人数
925	3	4900
927	1	110
928	3	240
929	2	1300
934	2	20160
938	1	12000
979	1	20000
1031	2	54
1032	7	120
1033	5	58
1050	1	—
总计	28	58942

资料来源：据《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和《渤海史考》综合统计而出。

一户或一家计为 4 人；一村计为 20 户；一船计为 50 人；“数万”计为 2 万；“余人”、“余户”均只计前面的整数；人数完全不明确的事例则不计入内。下同。

据《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统计，契丹共有 55 批移民进入高丽，约有 2020 人。

头人。比如,“黑水酋长高子罗率百七十人来投”^[13]“骨夫率部落五百户来附”^[14]渤海“左首卫小将冒豆斡、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一千户来附”^[15]除了群徙之外,几个人结伴前往,甚或只身、挈家投奔也是中国移民迁移到高丽的方式之一。

表2 中国移民迁移事例统计表

人数 国别	不明	1 - 10	10 - 50	50 - 100	100 - 500	500 - 1000	1000 - 10000	10000 以上	总计
渤海	3	2	10	0	4	1	3	3	26
契丹	2	23	19	3	4	1	0	0	52
金	3	6	5	2	4	2	8	0	30
总计	8	31	34	5	12	4	11	3	108

资料来源:据《高丽史》、《高丽史节要》、《金史》、《辽史》综合统计而出,其中不包括被动迁移者。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被动迁移方式,即作为俘虏被带到高丽。争夺曷懒甸时,高丽崔弘正曾在雄州之战中大败女真,“俘斩八十级,获车马兵仗无算”^[16]接着,元帅尹瓘又“献俘三百四十六口、马九十六匹、牛三百余头”^[17]有时,这种迁移也会达到很大规模,不容小觑。1017年,契丹萧合卓围攻兴化镇九日而不克,高丽将军坚一、洪光、高义出战,“大败之,斩获甚多”^[18]1019年,契丹兵经过龟州,“郜赞等邀战大败之,生还者仅数千人”^[19]虽然没有关于战俘的确切记录,但是从“斩获甚多”和生还者“仅数千人”可以推知这些必定都是数万乃至十数万人的大规模作战,其掳获的战俘应当不会少。况且,在高丽掳获战俘是可以升职的,左右卫猛校尉吴幸、李璜、申先立等人抄掠丹兵七人就被赐职一级。俘虏还有另外一种,即因透漏消息而被抓获。1037年,“西北路兵马使捕东女真交通契丹者沙伊逻等五十五人,送于西京。”^[20]这些人只有获得高丽国王的制书许可才能回归故里,否则只能永久留于高丽,所以他们也可算移民之一。

二、高丽对中国移民的接收与遣还

面对10-13世纪东亚多国并立的复杂局势,高丽依靠灵活的外交手段,成功地在契丹、宋或金、宋的对峙下绵延国祚。为了避免与大国产生冲突,高丽处理投归民的态度通常极为谨慎,除“本国边民曾被蕃贼所掠、怀土自来者与宋人有才艺者”外,其他人等并不许入。^[21]

但是事实证明,关于投归人口的纷争依然存在。1073年,契丹人来投,“其追捕者越入长城,逼静州”^[22]到了13世纪二三十年代,保州逃移人口一度成为影响金、丽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以上事件说明高丽并没有严格执行旧有的移民制度。那么,高丽为什么要冒险接受这些移民呢?一是因为这些移民可以补充因战争而丧失的劳动力,加强生产;二是因为这些移民可以充实边疆,增强防御能力,拓展北方领土。其中后者是更为重要的。高丽自太祖立国起就一直努力向北扩展,企图恢复高句丽旧疆,因此,放宽限制、接受大批移民实边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举。鉴于“外蕃人相继归附”,文宗更是下制“命后有投化者,可招谕而来”^[23]

然而,这些移民要按正常途径进入高丽,还需获得高丽王朝的许可。1017年,“东女真盖多弗等四人来投,请效边功”,许之,并优礼赐物。^[24]但有时,这些移民也可能被拒。1185年8月,“金男女十八人来投登州栖霞县,下诏发还。”^[25]从记载来看,被拒的事例比较少,一般都可以获得许可进入。抵达边境后,这些移民要先向高丽边防官申明来意,然后由边防官上报朝廷,经中

12世纪初期,女真大举反辽,原辽统治下的边民大量逃入高丽。高丽亦在此时趁机夺取了保州城。金灭辽之后,以承认高丽对保州的领有权为基础,希望高丽能够归还从保州边地逃到高丽的民众。但是,高丽不断地遣使“请免追索保州投入人口”。1130年,由于宗室完颜瓘的谏言,金最终放弃了对逃移人口的追索。

央官署审议讨论和国王下制同意后方可进入高丽境内。1081年8月,西女真漫豆等十七人挈家投归高丽一事最能体现这一程序。其抵达之后,地方将之上报中央。然后,礼宾省和礼部展开了争论,礼宾省认为应该恪守旧制,禁止其入内;礼部尚书卢旦却认为“漫豆等虽无知之俗,慕义而来,不可拒也,宜处之山南州县,以为编户”,最后高丽文宗采纳了卢旦的奏言。^[26]可见,中央处理外国移民事务的机构一般是礼宾省和礼部,但有时则由高丽国王直接处理。1079年4月,东北面兵马使奏称“女真耶邑干自定州弘化戍来款云:‘父阿罗弗、母吴晓、兄齐主那等六人曾于丁巳年向化来投,愿随居之。’”高丽文宗曰:“夷狄虽同禽兽,尚有孝心。宜令随父母亲属徙置岭南。”^[27]

一旦被批准入境,就成为高丽治下的民众,登记于高丽户籍,并不得随意离境。如果想回归故国,必须获得高丽政府的同意才可以脱离高丽籍。1055年9月,宋都纲黄忻状称自己和两个儿子蒲安、世安皆来投归高丽,但是想起82岁的老母尚在本国无人照顾就悲恋不已,希望长男能够归国供养老母。礼宾省将这一情况上奏给文宗,文宗有感“‘越鸟巢南枝’,况于人乎”,遂将蒲安遣还。^[28]此条虽系移民商人的事例,但是想必对所有类型的移民都适用。

除了已获得高丽身份的移民及其亲属可提出申请之外,尚在母国的亲戚和母国政府也可以提出遣还要求。1022年,西女真鱼尼底来告:“亲姑曾随投化人昧那来住大国京都,已经数年,思恋本蕃,乞以土马赎之。”显宗即命放归,并还其马。^[29]而母国政府则经由派往高丽的使臣提出申诉,例如宋使到高丽后,只要“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30]1132年11月,宋定海县上奏:“民亡入高丽者约八十人,愿奉表还国。”^[31]这样看来,具有宋帝的批示即可要求高丽放人,而高丽也都会遣还。不过,两国关系紧张时,遣还逃移人口则不那么容易,金、丽关于保州逃移人口的交涉即是一例,往复数年而不成。

迁移到高丽的民众还必须遵守高丽的法律制度,首要的一点便是忠于高丽,否则就要被治罪。东女真酋长阿兜干投归后,继而转向投靠契丹。高丽认为这实在是“罪莫大焉”,虽然首领高之问等当时在女真境内,但是高丽不惜越境追捕,“密遣军士拘执入关,拷讯端由,依律科罪”。^[32]

三、中国移民在高丽的生产和生活

迁移到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通常按照集团聚落居住生活。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高丽政府对移民采取了集中安置的办法。前面已经说过,多数中国移民都属群徙,而高丽政府在安置这些移民时并没有将其分散,而是按照投归群体集中安排到一地。1029年,“东女真大相哈拔率其族三百余户来投,赐渤海古城地处之。”^[33]1030年10月,“契丹奚哥、渤海民五百余人来投,处之江南州郡。”^[34]1031年10月,“契丹王守男等十九人来投,处之南地。”^[35]1078年9月,“女真高麻秀等十四人来投,处之南界州县。”^[36]从史料来看,大概十人以上的移民群体,高丽都会采用集中安置的办法;而对于十人以下的投归民,高丽则采取分置的办法。1017年8月,“黑水靺鞨阿离弗等六人来投,分处江南州县。”^[37]

不仅如此,对于大规模的移民聚落,高丽还会别赐州县来进行安置。这些州县皆隶属于归顺州。起初,归顺州是中国的中原统治者用来羁縻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当少数民族来投或者请求内附之时,统治者就在边疆置州县安排这些归化人。归顺州有一定的自治权,首领仍由原来

掌宾客、燕享,高丽太祖四年置。成宗十四年改客省,后复改礼宾省;忠烈王二十四年改典客寺,寻改礼宾寺;以后就在典客寺和礼宾寺之间频繁更换。

掌礼仪、祭享、朝会、交聘、学校、选举之政。国初称礼官,成宗十四年改为尚书礼部。后来名称多经变更,至恭让王时改礼曹。

的渠帅担当。高丽借鉴了此种做法，开始在本国的长城附近设归顺州来安置迁入的移民。后来，许多投归民都希望能“依东蕃例，分置州郡”，^[38]于是高丽逐渐下赐州名，增设归顺州。1073年6月，女真三山、大兰、支栲等村1238户请求归附，高丽许之，着有司奏定州名，且赐朱记。^[39]紧接着，高丽又接纳了其他11个东女真村落内附，并设置滨州、利州、福州、恒州、舒州、温州、闽州、戴州、敬州、付州、宛州等11州来安置这些移民，“各赐朱记，仍隶归顺州”。^[40]归顺州的设置进一步加强了移民的集团聚落生活。

金末，契丹将军鹅儿和乞奴反叛，率数万人窜入高丽境内，最后驻于江东城。1219年正月，高丽、蒙古、东真联军攻陷了江东城。高丽将军赵冲遂将“契丹俘虏分送各道州县，择闲旷之地俾之聚居，量给土田，业农为民，俗呼契丹场者是已”。^[41]与此相同，聚落居住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生。不少人在迁移途中都带有生产资料。929年6月，渤海人洪见等以船20艘搭载民户来投，其中随船附带了大量物资。^[42]1116年，契丹来远、抱州二城流民驱羊、马数百来投。^[43]遗憾的是史料无法提供这方面完整的记载。

除了自身携带的之外，移民还可以从高丽政府处得到生产、生活资料，如田地、房屋等。契丹东京民巫仪老、吴知桀等20余人来投，被赐予田宅和物什；^[44]东女真耶于害等6人率众款塞，也被赐田宅；^[45]稍后，马波等男女48人请入定州关外为编户，同样被赐予田宅。^[46]有时，高丽政府也赐衣物给移民。1031年11月，高丽国王“命有司赐诸国来投人衣服绵絮”；^[47]1039年12月，制曰“候在大寒，风雪严凝，言念贫穷必至冻馁，其外国投化人及没蕃怀土男女共八十余人，有司量其老幼，各赐绵布”。^[48]田宅和衣物不仅使移民能够尽快安定下来，而且也鼓起了他们开拓新生活的勇气。从此，这些移民就逐步展开了自己的小农生活，并像高丽课户一样承担国家的租税和贡赋。

耕种的同时，移民还从事一些家庭小手工业。不过，也有些移民完全以手工业为生。1101年，擅于织毡的女真毡工古舍毛等6人投归高丽。像这种明确记载的手工业者移民绝少，大部分都是混杂在移民群体或是俘虏中迁入的。尤其是俘虏中的工技，对高丽的手工业贡献颇大。史载“契丹降虏数万人，其工伎十有一，择其精巧者，留于王府，比年器服益工”。^[49]可见，由于契丹工匠的努力，高丽的手工业技术日益进步，特别是丝织业最能代表契丹移民的这种技术贡献。

12世纪20年代，到访高丽的宋使徐兢在记述其见闻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曾提到：高丽初期不善蚕桑，因此要从宋商处购买。不过，在契丹战俘的辛勤劳作下，先进的丝织技术得以推广，从而使高丽也能够织造文罗、花绫、紧丝和锦罽等精美的丝织品。

契丹的中京道灵河（今大凌河）流域，地生桑麻，辽朝统治者便把一些善于织纴的人安置在那里。辽世宗的时候又进一步俘掠以丝织闻名的河北定州，将这些民户也安置在灵河流域。从此以后，灵河沿岸便以“工织纴，多技巧”^[50]声名远播，而契丹也被赞为“锦绣组绮，精绝天下”。^[51]这些先进的技术随着契丹移民也同时流入高丽。他们在生产中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契丹的织造技艺传播到高丽，从而使高丽的丝织技术日臻完善，染色水平也有了大的飞跃。

劳动之余，移民还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高丽睿宗巡幸南京之时，周围的契丹移民曾奏契丹歌舞、杂戏以迎驾，结果引得睿宗饶有兴致地驻蹕观看。总之，中国移民迁移到高丽之后，努力生产、积极生活，同当地民众一起为高丽的发展播下了智慧的种子。

结 语

本文所述的农业、手工业者与其他仕、商移民一起构成了辽、宋、金时期前往高丽的中国移民。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本土处于分裂状态，所以移民便因之而具有了与此后大一统元代不同的特点。其一，绝大多数迁移都与中央政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元却凭借王室联姻、达鲁花赤制度、流放制度直接介入了移民的迁移。其二，辽、宋、金时期前往高丽的移民构成比较简单，大致说

来有农民、工匠、商人、文人和官吏、俘虏等，但是元代的移民却形形色色，不仅包括前一时期的各类人，而且还出现了罕见的公主、罪犯等类型。其三，对峙的局面、分裂的状态使前往高丽的移民数量落后于元代。其四，移民迁移多是出于生活所迫，但是元代移民成分的复杂导致了迁移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其五，移民定居后通常都接受高丽政府的管辖，但是元代移民的地位却大大提升，如公主、达鲁花赤（留居不归者）以及各级官吏更成为监视与控制高丽的媒介。观之10-14世纪中国移民迁往高丽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东亚移民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变动紧密相关。移民不仅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还促成了不同民族的融合。

[注释]

- [1]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159册第112页。
- [2]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89页。
- [3] 周南京：《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 [4] 萧永坚：《试论侨民归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20页。
- [5]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14页。
- [6] (晋) 陈寿：《三国志》卷28《邓艾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780页。
- [7] [日] 上田正昭：《归化人》，中央公论社，1965年，转引自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 [8] [日] 石母田正：《日本古代国家论》，岩波书店，1973年，转引自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 [9] [韩] 全海宗：《试论东洋古代史上“归化”的意义》，《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 [10]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9《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79-6180页。
- [11] (元) 脱脱等：《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6页。
- [12] (元) 脱脱等：《金史》卷135《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1页。
- [13]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53页。
- [14]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20-121页。
- [15]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54页。
- [16]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264页。
- [17]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265页。
- [18]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08页。
- [19]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10页。
- [20]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37页。
- [21]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206页。
- [22]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94页。
- [23]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93页。
- [24]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08页。
- [25]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418页。
- [26]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206页。
- [27]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201页。
- [28]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68页。
- [29]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16页。
- [30] (元) 脱脱等：《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53页。
- [31] (元) 脱脱等：《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51页。
- [32]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52页。
- [33]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22页。
- [34]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24页。
- [35]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26页。
- [36]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201页。
- [37]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08页。
- [38]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93页。
- [39]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94页。
- [40]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95页。
- [41] (李朝) 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六年正月记事，韩国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1973年。
- [42]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58页。
- [43]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291页。
- [44]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42页。
- [45]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52页。
- [46]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61页。
- [47]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27页。
- [48] 《高丽史》，史部第159册第141页。
- [49] (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9，“工技”条，《天禄琳琅丛书》，故宫博物院，1931年影印版。
- [50] (元) 脱脱等：《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宜州”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487页。
- [51] (宋)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2“四京本末”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7页。